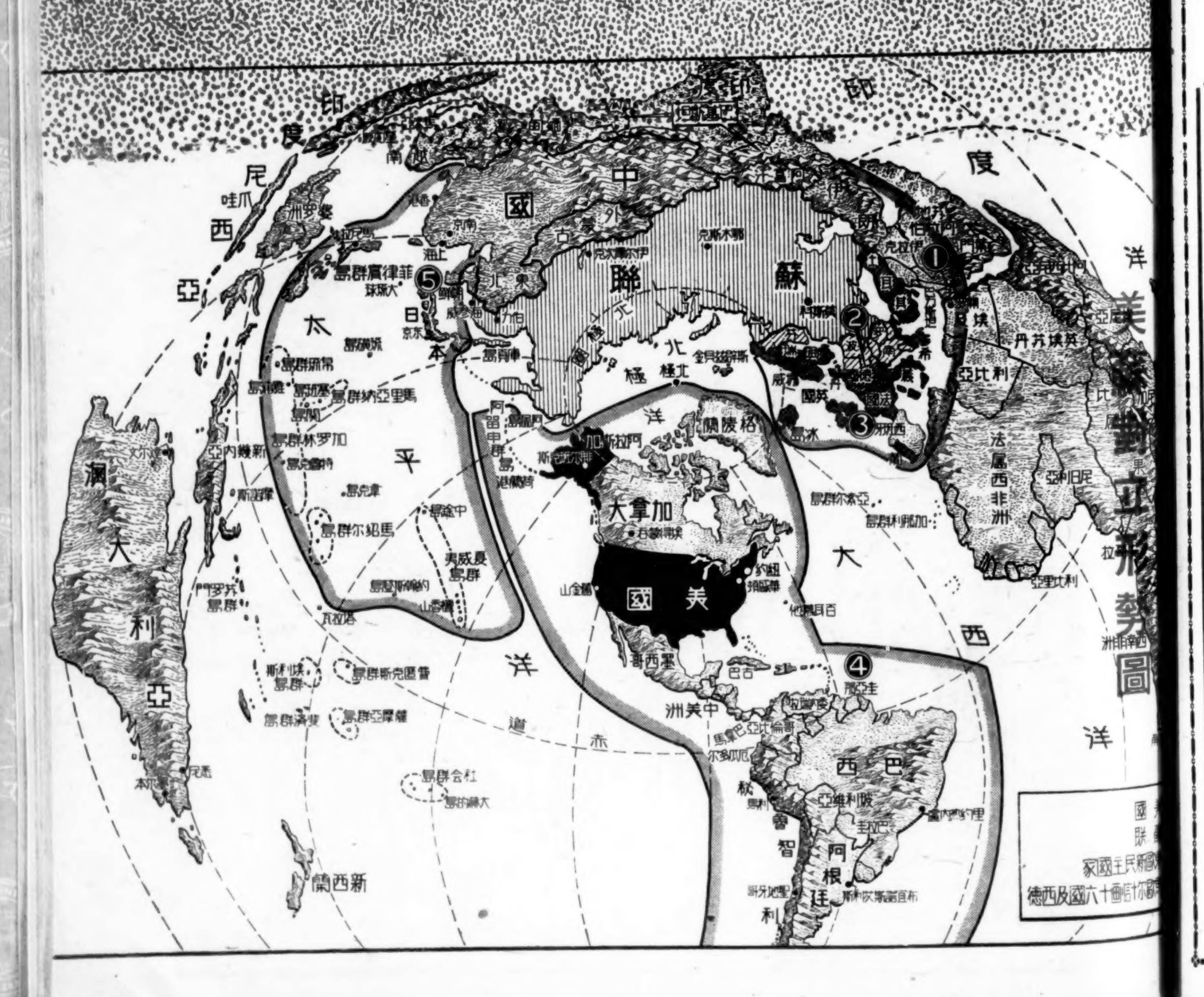
國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二十三期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 ★ ★ ★ ★ ★ ★

美國競選雜景

——世界的中畫圖——

(上)史塔森假裝進步姿態，獲取婦女選票。



(左)杜威—紳士派頭。他在靜靜地計算着選票。



華萊士對勞工演說：「爭取一個更好的明天」

(右)杜魯門在民主黨人的年餐會中演說，主張給黑人以「人權」，南方諸州黨代



(上)麥氏競選專車　(下)共和黨馬戲團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第二十三期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二日出版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發行所　世界知識社
上海(〇)河南中路八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九三四二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目錄

零售：每册法幣五萬元

預定三月共十二期計
平寄：五十萬元
掛號：六十二萬元
航平：六十七萬元
航掛：八十萬元
國外平寄：半年美金四元

·郵費漲價敬請照補·國內外各大書店均售

瞭望臺

司徒大使的聲明

在我國學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運動洶湧聲中，美大使司徒雷登博士於六月四日發表聲明，大意是說中國學生反對美國對日政策「嚴重地損害了中美之間傳統的友誼，倘如發展下去，必將造成不幸的結果；」他又說「本國（美國）被指為扶植日本恢復其軍閥與經濟帝國主義。這種指摘顯然是錯誤的。」他警告中國人「訴之你們的良心，……倘如你們用欺詐的手段來達到陰謀，那你們不但是損害了祖國。你們也是損害了你們自己作為中國學生和智識份子的立場。」（引文按照大陸報所載譯出）措辭嚴厲，得未曾有。假如這是司徒校長在燕京大學的教室中對學生致訓，也已經不免「言重」；但現在司徒先生却是以美利堅合衆國大使的資格，對中國人民說的話。老實說，我們中國人民的自尊心是大大地被刺痛了的，我們簡直啼笑皆非。

中國人民嘗夠了日帝國主義的壓迫和蹂躪。他們對於這隻餓虎的可能再起，確乎深以為懼；對於美國一步步扶植他們的具體事實，確乎引以為恨。青年們對於這種政策的大聲抗議，正是出於愛國的動機，激於民族的良心，這應該是中國知識份子的光榮。退一步說，假如外國對於中國的國民外交運動有什麼意見，或有什麼解釋時，那末也儘可循外交的程序，向我國政府提出抗議。這是一國大使的責任。外國大使是中國的貴賓，却不是中國人民的統治者。他憑什麼可以越過駐在國的政府，而對駐在國的人民致起訓詞來？這種打破外交程序的創舉，不但刺痛了中國人民的自尊心，而且也表示它對於政府的蔑視。正如司徒大使所說：這樣的情形「倘如發展下去，必將造成不幸的結果。」

司徒大使說：「我不必強調我對中國學生團體的情感，如果我的生平不足以證明之，是即我畢生的完全失敗。」我們要告訴司徒大使，如果確如先生自己所說，「一生工作的主要目的，向係為協助增進中國學生的幸福及其對自身與國家成熟的責任於萬一」的話，那末，先生倒確是光榮地成功了的。試看今天中國青年的廣大自覺；不但視五四時代毫無愧色，而且還表現着更大的進步。這種進步固然由於時代和環境，但我們也自然不妨慷慨地說是靠了司徒先生「萬一的協助」吧。

但是，司徒先生今天的身份，乃是美國的駐華大使。這誠然是一個光榮的台衡。但美國的大使的目的是在執行美國的政策。倘如從這一角度出發的話，我們就不能不遺憾地說是「完全失敗了」。因為時勢變了，今天中國青年的空前自覺已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他們已不能忍受一個帝國主義再起的威脅；他們已決不能再接受一個可能比英日同盟禍害還深的後果；他們並且還密切注意到危害遠東和平的政策，而加以堅屈不撓的反對。他們用的絕非「欺詐的手段」，他們只是「訴之他們的良心」。

中美兩國人民之間有傳統的友誼，是不錯的，是應該寶貴的。今天中國青年一致抗議或反對的對象是美國扶日的政策，而不是美國的人民。也正惟為了鞏固這可貴的傳統友誼，中國人民必須喚起美國人民對於中國苦難的共鳴；美國人民必須幫助中國人民阻止一切可能威脅或禍害中國的政策。在這一點上，和司徒大使同為美國人的拉鐵摩先生，似乎對於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有更深刻的認識，拉鐵摩曾經說：「學生運動常常像推動前進的一陣浪；每一陣浪不但是本身有重要的意義，而且總是中國民族運動的前鋒。這些波浪成了現代中國發展的潮汐表。」

美國對華新動向

實在說來，司徒大使的聲明，不過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部份反映，他自己也對記者說過，這份聲明曾得到國務部的批准。這是跟前幾天美國駐滬總領



新「聖母」像　（蘇聯「文學報」）

事卡波特的演說「如出一轍」的。不過作為大使，又是在中國久住的人，司徒的聲明無疑更為「正式」、更為值得注意的。

從這篇聲明再來分析美國最近對華的動向，是怪有趣的。因為就種種事實看來，美國對華動向確乎又表現了一個新的階段。

美國衆院通過削減援外的費用，援華欵項也割去了六千三百萬元，這到下面再去說。這裏應該先提到的是美國來華貴賓的冠蓋不絕。美國經濟援華代表團團長賴普漢已到中國，還帶來了以史蒂爾曼（時代雜誌董事長）為首的技術調查團，他們大概將在上海頓下來，展開「援華」的工作。紐約樞機主教史培爾曼也來到中國，受到豪華的招待，又在各地飛來飛去，特別和傅作義氏作過長談，他顯然負有着宗教以外的任務。

尤其顯得忙碌的是蒲立德和陳納德，他們飄忽無定的行止，要讓我來作起居注也很難。大體上說，北到瀋陽，南達海南，都有蒲氏的踪跡；陳納德氏則親臨太原，往返平瀋，尤其「席不暇暖」。這不過是比較注目的人物。至於其他的大小貴賓，自然更是記不勝記。北平、廣東和台灣不必說，甚至是遠在青海，馬主席也頗忙於遠方貴賓的酬酢。

在另一方面，各種各樣的「自由主義」運動或「革新」運動應運而生，這當然也是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受到外國貴賓的鼓勵或支持。

一句話，從經濟到軍事，從外交到內政，從中央到地方，從間接到直接，從秘密到公開，從言論到行動，從正面到側面，從在朝到在野……，這些就是目前美國對華新動向的顯著特點。

事實勝雄辯

事實最雄辯。美國有否扶植日本只要看事實。按照波茨坦協定，日本必須徹底解除武裝。現在的事實呢？日本最大軍港橫須賀、佐世保和吳港不但保留，且將予以擴大，此其一；麥克阿瑟指定將賠償盟國的驅逐潛水等艦二十八艘送交日警；又允許日本成立海上保安廳，暫撥監察艦三十八艘，以後再擴充至一百二十五艘，武裝警員八千名，以後再擴充至一萬名，此其二；日本原有飛機場、防空設備和地下工廠大部份仍予保留，在青森建築了九千五百呎跑道的飛機場，此其三；陸軍方面，允許日本軍事幹部以警察名義繼續保留，警察人數先擴大為十二萬五千人，繼又增為三十萬人，此其四；在經濟方面，保留鋼鐵年產量、紡錠數額、商船噸數、化學原料年產量及水電力等數字之鉅，那顯然不是為了提高日本人民的生活水準，而是為了恢復日本的侵略力量，此其五……。

鐵樣的事實，舉也舉不盡，以上幾點不過是犖犖大者。我們每天早晨打開報紙，總可看到觸目驚心的消息，且從這一星期的報上列舉事實如下：

一 六月三日——目前日本的對外貿易，幾已恢復至戰前狀態，輸入方面來自美國的佔十分之九。

同日——特萊柏報告書發表後，日本航業界因有美國支持乃大肆活動，最近日本船主協會已開始聯絡各輪船公司，準備要求政府將海運開放，恢復自由經營。（新亞電）

六月四日——在九州、本州、北海道諸島，日本原有的飛機場均已大事擴充，九州最近並完成新機場一處，而本州北端正在建築可以容納美國尚在設計中的最巨型轟炸機的機場。（路透電）

六月七日——日本造船工業現在已超過其本國需要量，有數造船工場將接受外國定造船隻之合同。（新亞電）

六月八日——日本輕金屬工業日漸恢復，製鋁公司漸復舊觀，……具有戰爭潛能的危險。（中央社電）

六月九日——麥帥正式批准對日棉貸六千萬美元，日本貿易廳長永井表示興奮。（合衆新亞兩電）

日戰犯重返南韓

扶植日本不但限於日本，而且還及於日本以前殖民地的南朝鮮。我們從這次南韓單獨選舉中，已經看到李承晚是何等人物；我們從不少美國記者的通信中，已知今天南朝鮮的情形是：叛國者高官厚祿，愛國者鐵索鋃鐺。

這還不够，據法國新聞社電傳，日本的三大戰犯最近竟然高視闊步回到朝鮮了。這三個人以前都


"Meet the Sweetest Little Gal in Deutschland, Veronica Dankeschön"


"What's A Burp Gun Wedding, Liebling?"

"But She's My Wife, Meine Frau, from America"

德境美佔區小景

（左）邂逅了這位美麗的納粹小姐（中）閃電結婚（右）「親愛的，她是從美國來的我的太太呀。」 （轉載「紐約時報」）

是在朝鮮的臭名昭彰的高級官員，如滿田為前朝鮮財政廳長，君山為前朝鮮銀行的董事，千原為前朝鮮的教育廳長，這三個人現在秘密隱匿於漢城與釜山之間，似乎負有重大的使命。駐韓美國官員對此一聳人聽聞的消息，「則既不證實，也不否認。」

兩個伴侶

美國競選雜景之一

（美國「民族周刊」）

朝鮮各報，從左到右，一致表示憤慨，大呼「正義的勝利何在？」據說美軍事當局打算發表官方聲明，以鎮定憤慨的輿情云。

我相信日本戰犯到朝鮮是事實，朝鮮各報記者不會個個「白晝見鬼」的。但可注意的是這三個戰犯，倘使未得當局的諒解，則即使具有三頭六臂，也何至於敢到南韓來？所以，他們的捲土重來，顯然是有人要「借重」他們的。

分裂朝鮮的政策，已引起了日益嚴重的後果，六月七日，連美國所委任的南韓臨時政府民政長官安在鴻也提出辭職了。據說安氏辭職以後，將與金九等合作，以從事朝鮮統一運動的努力。

美衆院削減援外款項

美國援外法案本是基於「自利」的動機，根本談不上什麼慈悲為懷的好意。六月三日，衆院撥款委員會決定把援外款項削減了百分之二六．七，並將使用期限自原定十二個月延長為十五個月，這一來，援華款項減少了六千三百萬美元。

拿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收穫，原是垣街老闆不變的算盤。這次「援外款項」好容易通過了，歐亞眼巴巴想望美援的人們，以為這回可喫了「定心丸」。却猛不防又來了這麼削減的一手，這真替獨佔資本家患得患失的死抓住錢袋的神情，托出了一幅生動的圖畫。

合衆社電傳歐洲人對於美國削減援外款項一舉，都覺莫明其妙。有的說「此乃選舉前的姿態，圖減輕美國納稅人的負担」；有的說「目的在打擊英國在巴力斯坦的政策」，又有的說「此乃孤立主義的復活」。

種種揣測，更叫人莫名其妙。其實很簡單，美國援歐巡迴大使哈里曼二日到巴黎那天就說得很明白：「援歐計劃最終目的是重建西歐自給自足的能力，使之不必倚賴美援，這是歐洲恢復經濟安定最可靠的辦法；」又說：「援外法案的目的，……要建立一個自給自足不賴外援的健全歐洲。」這就是說，你們別老是釘住美國不放，你們也終得自已想辦法！

沙灘上不能建立高樓大廈。要真想從美元來取得「安定」和「復興」，好天真的幻想！

六國對德協定

六月六日，美、英、法、荷、比、盧六國在倫敦成立對德協定，並發表公報，主要的內容如下：

（一）德境英美法三國軍事長官應早日與西德各邦領袖舉行會議。德國領袖將取得權力，召開制憲議會，以便起草德國憲法，再由各邦予以批准；

（二）由六國會同德國設立魯爾區的管制機關，以管制該區煤斤、焦煤與鋼的分配，但魯爾區並不因管制機關的成立而在政治上脫離德國；

（三）魯爾區的產物應為西德參加歐洲復興計畫的基礎；

（四）英美法軍事長官與德國各邦領袖會議時應審議並在可能範圍內重勘目前的邊界；

（五）對於外國在德的利益，應採取不歧視的原則，每國政府都應儘早考慮不歧視的建議。

這協定的主要意義，包括這樣二點：（一）排斥蘇聯，實現分裂德國的計劃；（二）以魯爾為德國復興的核心，而復興德國又為馬歇爾計劃的基礎。說來說去，這還是根據了美國原來的藍本。

公報發表後，反對來自各方面。蘇聯的眞理報說：「倫敦會議的各項決議，均與各重要國際協定相牴觸，必將遭所有愛好自由人民的拒絕。」德國的人民不分東西，也表示反對。如在佛蘭克福方面，德報一致認為「國際管制魯爾的辦法將破壞德國的經濟」；柏林方面的德國人民委員會，則發表宣言，斥為「分裂德國的第一步」。

在法國，從左到右的各黨派都取反對的態度。他們認為六國會議的管制魯爾計劃，不足以適當地保障法國的利益。他們認為法國及荷、比、盧將為英、美、德代表的意見所控制，甚至可使德國在英美與歐陸國家中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據路透電傳，六國協定雖已經法國內閣通過，尚須提交國民議會辯論。許曼內閣是可能因此而發生動搖。

聖地休戰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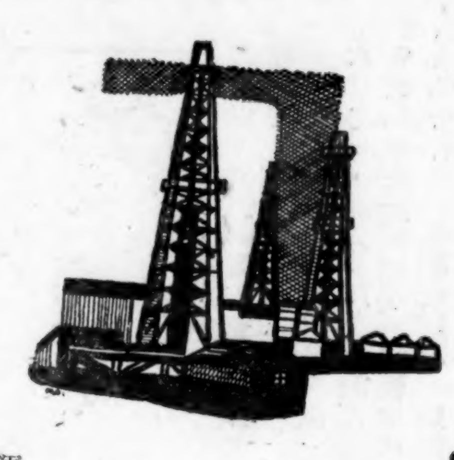
聯合國巴力斯坦調解專員貝那多特到巴力斯坦後，安理會於五日更授以解決休戰問題的自由權。貝那多特當於七日向阿猶雙方提出休戰四星期的建議。當記者執筆時，阿猶雙方均尚在商討中，據聞阿拉伯聯盟方面可能接受，而以色列國外長則對休戰計劃表示不滿意。

七日，蘇聯代表葛洛米柯向安理會提出要求，以美、法、比三國均已被邀派遣軍事觀察員至巴力斯坦，蘇聯亦擬派員參加。據八日紐約廣播，美國代表團將提出主張，認為休戰軍事視察團團員，應僅限於美國法國和比利時人。葛羅米阿則表示蘇聯將不同意摒除蘇聯代表的任何辦法。以後發展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了。

六月九日

論新民主國家的國有化政策(上)

陶大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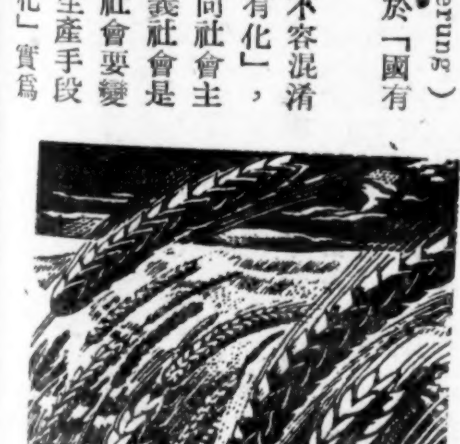
一 國有化的基本認識

國有化（Nationaliz tion 或稱國有運動）的涵義，是相當廣泛的。有些人把國有化與社會化（Socialization）混爲一談；也有人把國有化看成社會主義的實踐。在論述新民主國家的國有化政策以前，我們對國有化的本質，應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首先，我們必須認淸：「國有化」與「國有」，是兩個不同的經濟範疇。國有的經濟形態，即使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裏（特別是中央集權的專制封建社會）也是存在過的。我國漢武之世的鹽鐵官與榷酤官以及王莽時代的五均六筦制，就是這一型式的「國有」。歐洲各國在封建時代，也出現過類似的公營經濟。然而，這種國家經濟形態，是國有其名，官有其實的。（因而，我們冠以「國有」之名，至不恰當！）因爲，這個國（政權），是封建官僚（包括貴族地主與商人地主）的統治工具，它并不是屬於全國人民所有的。「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所以，官僚政治也必然是官僚經濟的集中表現。在這樣的社會裏，當然祇能有官僚資本，絕對談不到國家資本了。儘管我們可以稱它爲「國有經濟」甚至「國家經濟」，（我總覺得不大恰當）却萬萬不能稱它爲「國有化」經濟。（它絕對不能視爲一種「國有運動」！）因爲，經濟國有化，必須以政治全民化爲前提。（嚴格說來，祇有在「政治全民化」的國家裏，才可能有眞正的「國有」！）這就是「國有」不同於「國有化」或「國有運動」的基本特徵。

其次，「國有化」與「社會化」，無論在量的方面與質的方面，都不可混同。就量的方面說：「國有化」的領域，實要大於「社會化」。「國有化」的發展過程，應該從主要生產手段的國有，漸漸擴大爲一切生產手段的國有。而「社會化」不過是公營事業的泛稱，像地方政府經營的公共企業，可視爲「社會化」，而不能看作「國有化」。再就質的方面說，「國有化」是一種溫和的社會革命，而「社會化」却是一種妥協的社會改良。前者以創建新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爲終極目標，對既得利益集團，不抱姑息態度，爲了不流血，或少流些血，才用溫和的「國有化」來替代革命的「階級鬥爭」。後者則以維護現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或半封建社會）爲最大動機，肯定既得利益，爲了反革命或防止革命，才用一顆糖衣的「社會化」的毒丸，來麻醉革命羣衆，動搖革命意志與分散革命力量。上次大戰後（一九一九年），以考茨基（Karl Kautsky）爲首所倡導的德國社會化（Die Sozia Lisierung）運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所以，「國有化」必然是一種最澈底、最進步、最革命的「社會化」，而「社會化」却可能否定「國有化」的成果！但一種最澈底、最進步、最革命的「社會化」，是必須以新民主政權（即勞動人民政權）的建立爲先決條件的。也可以說：社會化＋（加）新民主政權＝（等於）國有化。因爲，祇有在新民主政權下，「社會化」，才可能是「全面的社會化」（Vol－ozialisierung），而不是「部分的社會化」（Teilweisen Sozialisierung）。這「全面的社會化」，當然無異於「國有化」了。

再次，國有化與社會主義，亦不容混淆。一般說來，社會主義可包括「國有化」，而「國有化」，充其量，祇能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過渡階段。因爲，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無階級、無剝削的社會。一個社會要變成無階級、無剝削，就必須使一切生產手段盡歸國家所有。這就是說：「國有化」實爲



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不過，這兒所謂的「國有化」，不祇是主要生產手段的國有，而是一切生產手段的國有。因而，祇有當國有的領域擴大到一切生產手段的時候，一個社會才可能變質爲社會主義社會。

在這兒，我們更得指出：一個社會倘要實現「國有化」政策，不管國有的領域是大是小，但政權必須操在勞動人民手裏（因爲任何國家勞動人民在全國人口中，一定佔到絕大多數。政權操在勞動人民手裏，始能達到或接近「政治全民化」），却是最起碼也最基本的條件。否則的話，所謂「國有化」者，祇是統制經濟（資本主義式的）或國家資本主義的別名而已。在希特勒時代，德國的獨佔性企業，也曾掛上過一塊「國有」的招牌；（有人還美其名爲「國家社會主義」，眞叫活見鬼！）現在英國的工黨政府，更大吹其牛，說在實行道地的「國有化政策」。然而，由於兩國的政權，分別爲法西斯軍人與工人貴族所霸持，他們非但不會通過「國有化」政策來消滅經濟剝削；反要假「國有化」之名來保衛大資本集團的既得利益。譬如：今年元旦收歸國有的英國國內運輸工具，不僅化了英國政府一、○○○、○○○、○○○英鎊的代價（發行債券），并且每年要付較高的利率（普通公債利率爲百分之二·五，而新鐵路債券的利率竟爲百分之三！）雖則，英國國內運輸工具已加上了「國有化」的美名，但它并未揚棄資本主義的實質，從前的物主反可坐享其利！英國如此，蘇聯與東歐以外的許多其他國家，也都一樣。（甚至在美國，也有所謂類似「國有化」的T·V·A·計劃。）儘管它們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國有」企業，但因它們不是資產階級專政，就是封建官僚與買辦階級專政，所以，「國有化」的利益必然是從屬於資產階級或官僚買辦階級的。像這樣的「國有化」，非但不可能發展爲社會主義，並且足以歪曲與阻滯社會主義的發展！英國現任工黨主席辛威爾（Shinwell）也不得不坦白承認，說：「主要工業的國有化，并不是社會主義。」（五月二日在愛丁堡發表談話）

由此可知，國有化政策與新民主政權是必須結合在一起的。沒有新民主政權，就不可能有澈底的、進步的、革命的國有化政策；沒有國有化政策，新民主政權也不容易有深厚堅實的經濟基礎。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必須以國有化政策爲橋樑——并且是唯一的橋樑！這澈底的、進步的、革命的國有化政策，也可稱爲新民主主義的國有化政策。在這篇文章裏，我想把東歐新民主主義的國有化政策，作一個詳盡的介紹與檢討。

二　兩大惡瘤：官僚資本與列強資本

戰後新民主國家的國有化政策具有兩大基本任務：一方面是剷除官僚資本與清算列強資本；另方面則在發達國家資本與扶育民族資本。由於新民主政權的奠立，戰前東歐各國的官僚資本都被沒收，而變質爲國家資本；同時，民族資本也從列強資本裏解放了出來。誰都不能否認：官僚資本與列強資本是國家經濟與國民經濟的兩大惡瘤。這兩個惡瘤一天不除，國家經濟與國民經濟也一天得不到健康。因而，在評述新民主國家的國有化政策以前，對戰前各國官僚資本與列強資本的毒素，有剖解的必要。

舊波蘭：戰前波蘭的五大專賣事業（即食鹽、菸烟、酒類、火柴、彩券），就是官僚資本的集中形態。其次，化學工業（佔51%）、炭酸鉀工業（佔100%）、鐵路（佔93%）、鋼鐵工廠（佔70%）、煤礦（佔30%）等，也多爲官僚資本所操縱。一九二七年時，官僚資本約佔國民財富的九分之一。至於列強資本也幾乎侵入到舊波蘭的每一個主要的經濟部門裏了。一九三七年時，爲外資滲透的波蘭企業公司，共達三六三個之多。在各大工業內，如石油工業（外資佔86%）、煤氣工業（佔83%）、冶鐵工業（佔57%）、電力工業（佔55%）、化學工業（佔9%）、木材工業（佔46%）、皮革工業（佔39%）、礦冶業（佔31%）、交通運輸業（佔29%）、紡織工業（佔27%）、造紙工業（佔26%）等，外資尤爲充斥。倘就舊波蘭的全部工業資本而言，外資竟約佔了百分之四十。（其中，以法、美、德、瑞士、英爲多）此外，三分之一的私人銀行與保險公司，也直接操在外人手裏。

舊捷克：在東歐各國中，惟有捷克是一個高度工業化或資本主義化的國家，所以，戰前捷克的官僚資本是從屬於金融資本的。但在各種獨佔企業中，仍滲有大批列強資本，尤以德、英、美三國爲主。以工業最發達的波希米亞省而論，德國資本就約佔到全部工業資本的百分之四十。就個別工業部門來說，德國資本幾乎壟斷了紡織工業（德資佔56%），造紙工業（佔58%）、玻璃工業（佔60%）、煤業（佔45%）等。

舊南斯拉夫：在戰前，南斯拉夫依然是一個半封建的純農業國，工業資本還很幼稚，且爲列強所霸佔。官僚資本的活動對象，是兼併土地。舊南斯拉夫地權的高度集中，就說明了官僚資本的猖獗。（請參閱拙作「戰後南斯拉夫的經濟改造」一文，載新中華六卷五期）而列強資本所覬覦的，則爲礦

冶工業。譬如：德國資本壟斷了煤礦，法國資本壟斷了銅礦，英國資本又壟斷了鉛礦。在全般工業生產中，列强資本約佔了百分之五一·四。

舊保加利亞：戰前保加利亞的官僚政府，是與外國資本家沆瀣一氣的。因而，舊保加利亞的官僚資本與列强資本也就混成一片。這中間，尤以英、法、德、美、義諸國的資本，最爲雄厚。像菸烟工業（外資佔69%）、煉糖工業（佔61%）、造紙工業與建築工業（各佔52%）、食品工業（佔39%）、紡織工業（佔33%）等，都爲列强資本所瓜割。

舊匈牙利：戰前匈牙利的官僚資本，一方面從事於土地兼併，另方面又壟斷了獨佔性的企業（像鐵路、水運交通工具、鋼鐵工廠、機器工廠、木材工廠等）。再因舊匈牙利長期爲奧地利的臣邦，在上次大戰前，約有二分之一的外資，來自奧國，另有百分之四十，來自德國。在兩次大戰之間，德奧的地位，慢慢由英、法、美三國取而代之。一九三九年時，在一切列强資本中，英、法兩國佔了百分之三六，德國佔了百分之十七，美國佔了百分之十，義大利佔了百分之十三。

舊羅馬尼亞：戰前的羅馬尼亞，雖是全歐最窮的國家，但以勃拉狄諾家族（Bratianu Family）爲首的官僚資本，聲勢倒是不可一世的。像鐵路、電話、大銀行、海港、大森林、大漁場、大農場、大礦場與大工廠，幾無一不被官僚資本所壟斷。一九二七年時，其總值已達四、五三八、七八〇、七二五拉埃（Lei，羅幣單位）！其次，由於羅馬尼亞蘊藏着豐饒的油田，它就成爲列强資本角逐的場所。全羅大小油井共有二千五百餘座，幾乎約有十分之九，是直接或間接爲外資所控制的。此外，像鋼鐵工業、化學工業等，也遭遇着同樣悲苦的命運。

儘管說，戰前東歐各國官僚資本與列强資本的政治影響與經濟影響，有着程度上的不同，但它們絞殺國民經濟與摧殘國民生計，却是幷無二致的。戰前東歐經濟發展的長期停滯，就可說是官僚資本與列强資本作下的孽！幷且使東歐各國降爲半殖民地與殖民地的地位。

三、鋪一條產業革命的新路

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對東歐各國而言，就是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東歐人民吞了淚、淌了汗、流了血，終於建立了新民主政權。爲了廓清封建殘餘與帝國主義勢力，戰後東歐各國，就推行了革命性的土地改革與國有化政策。兩者是並行不悖，相輔相成的。土地改革在消滅封建的地主制度，改善農業生產關係與發展農業生產力；國有化政策則在剷除半封建性的官僚資本與半殖民地性的列强資本，來鋪築一條產業革命的新路。波蘭工業部長希拉萊·明克（Hillary Minc）給我們指出的國有化政策的十大目的，可謂透闢之至。他說：

第一·爲了加速地與有計劃地從戰爭廢墟中重建起來。

第二·爲了避免經濟上的騷亂、恐慌與失業。

第三·爲了節制大資本家的浪費與奢華。

第四·爲了使國民經濟配合國民的需要——配合農民、工人與智識份子的需要，而不是配合資本家追逐利潤的需要。

第五·爲了全面發展農村，使它們從貧困、落後與愚昧中超脫出來。

第六·爲了爭取獨立的政治主權與經濟主權，使國家不再變爲外國資本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第七·爲了把堅强的政治民主，建立在經濟民主的廣大基礎上。

第八·爲了消滅資本主義的剝削，使勞動人民富裕起來。

第九·爲了使勞動者變爲自由人，而不再被視爲機器的奴隸。

第十·爲了使國有化經濟的生產力，超過資本主義經濟的生產力。（均見明克氏向第九屆國民會議的報告辭）

這十大目的的總方向，無非是通過一條康莊的產業革命的新路，把國民經濟導上自由、獨立、繁榮的光明前程去。

現在，我們來看看各新民主國家國有化政策的實踐過程：

新波蘭：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波蘭政府頒行的國有法令，有下列四項重要規定：（一）大工業、鐵路、航空、棧房、運輸工具與銀行事業，盡歸國有。（二）所謂大工業，係指單獨工廠僱工人數平均在二百人以上者。（三）承認小企業的不可侵犯性，幷鼓勵小規模的私人經營。（四）凡敵人（德人）與叛賣國家利益的資本家所經營的企業，無償地收歸國有，其他收歸國有的私人或外資工廠，一律照市價予以補償。補償的方式，或用現金，或用政府債券。這個法令施行後，約有百分之四十的製造工廠，收歸國有了。國有工廠所擁有的工人，則佔到全波工人的百分之五三。在這些收歸國有的工廠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無償的，僅祇三分之一以下是有償的。（未完）

封面地圖說明

這幅地圖說明在戰後美蘇對立形勢的中間，美國如何在世界各方面擴展它的勢力。它的擴展分爲五個步驟：一、在中東和東地中海，援助希土。二、在中歐，重建普爾，復興德國，作爲歐洲反蘇的前哨。三、在西歐，建立西歐軍事聯盟，作爲美軍登陸歐洲的跳板。四、在美洲，成立汎美聯防，以壯聲勢。五、扶植日韓，作爲遠東方面反蘇的前哨。

本圖爲本社即將出版的「世界現勢圖解」（金仲華編，朱育蓮繪）中的一幅。

從天皇到浪人

——軍國日本的政治面——

鄭森禹

一

美國扶植日本，近來已由庇護舊勢力的政治扶植，保留舊體系的經濟扶植，發展到重整武裝的軍事扶植階段，這是周知的事情。但政治、經濟、軍事，三者是不可分的，軍事且是政治經濟的延長，所謂發展到軍事扶植階段，並不是政治經濟的扶植已經告一段落或不再重要；相反的，正因爲扶植階段發展到軍事，是需要更高的政治、經濟的扶植，作適當的配合。重整武裝必須配以強力的政治機構，高度的經濟設備。所以，在發展軍事扶植階段中，政治經濟的扶植不但沒有轉鬆，而且更在加強。顯然，最近美國在日本所推進的，從天皇到浪人之全面的政治扶植，從生產到貿易之全面的經濟扶植，是配合軍事扶植之新的階段的。

雄辯終是辯不過事實，有誰能否認日本陸海警察，正在擴張武裝；有誰能否認從天皇到浪人，日本各政治階層中反動勢力的活躍；有誰能否認日本的軍需工廠，不少又在冒烟；有誰能否認無數日本戰犯，始終逍遙法外，且多依然高居要津？軍國日本的復活，昭然若揭！

關於美國在日軍事扶植情形，我們在上期本刊「軍國日本的復活——從陸海到天空」一文，大體已加敘述，這裏想再就政治扶植方面來察看一下。

美國對日政治上的扶植，是多方面的，從天皇到浪人，凡是舊的勢力、舊的機構、舊的人，無不庇護與容養，而對於實際的進步力量，則壓力備至。具體的說，大致可以分爲下列各點：

一、提高天皇威權，鞏固軍國日本的核心；

二、粉飾內閣，維護原來統治機構；

三、支持反動政團，放縱法西斯分子的活動；

四、疏忽整肅工作，寬容戰爭罪犯；

五、壓迫進步勢力，阻礙進步改革。

二

先從天皇說起。

依照波茨坦宣言，「欺騙和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從事於征服世界的威權和勢力，必須永久予以排除。」如所周知，這個「領導」的「威權」，即指天皇。可是，在美國獨斷管制之下，二年餘以來，天皇威權不僅未被排除或減削，近來且有重加提高之勢。所謂「民主新憲法」的開宗明義第一條，就寫着：「天皇乃日本國之象徵，爲日本國民統合之象徵」，第二條又規定「皇位爲世襲」，義同舊憲法的「萬世一系」。麥克阿瑟曾說「日本天皇具有政治性和宗教性的兩重人格，祗需去除其政治上的領導力即可，宗教性的精神上道德上的領導者，仍可讓其存在」，以作保留天皇制度的辯解。但事實上「天皇乃日本之象徵」，「日本國民統合之象徵」，既已明白制定於憲法之首，豈僅止宗教性而不是政治性？其實政治性之上再加上宗教性，正是日本國體的特徵，政治性的權力作用加宗教性的精神作用，也正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精髓。

兩年半餘來有關天皇威權的發揮，其具體表現，也仍一如戰前，例子舉不勝舉。本年三月一日，連美國紐約先鋒論壇報也不得不說：「首拍片山向

美麗的謊言

麥帥：「日本的財閥、軍閥統統已經被解散了……」（美國「民族周刊」）

日皇報告內閣總辭職時，其行動像日皇的地位沒有經過變動一樣。」又說：「如有人以爲一九四八年的日本，已與一九四一年的軍國主義日本沒有相同之點，實在是幻想而已。」

又本年四月間，「皇太子」在和歌山縣旅行，有人直呼之爲「裕仁的兒子」，竟以「犯不敬罪」，被警察所提向司法機關控訴。這難道是「民主日本」所應有的現象？

再，本年五月下旬有日皇退位的傳說，麥克阿瑟總部高級人員鄭重闢謠，宣稱：「這顯然只是謠言而已，我們沒有聽說日皇有退位的意思，只知道並相信日皇將無限期保持其皇位。」原來波茨坦宣言中所明白規定「必須永久予以排除」的「威權」，美國業已決定要予以「無限期保持」了。

三

波茨坦宣言所說「欺騙和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從事於征服世界的威權和勢力」，「威權」指天皇，「勢力」是指以天皇爲核心的法西斯軍閥、財閥、封建地主、貴族、官僚、流氓（浪人）集團。代表這集團的行政中心是內閣，上層政治組織是保守政黨，中下層機構是半公開或地下活動的無數法西斯政團。

現在的情形是：內閣的本質一成未變，反動政黨改頭換面，法西斯組織猖獗加厲，從天皇到浪人的軍國日本的政治面，完整如舊。

試看從幣原內閣、吉田內閣、片山內閣，到現今的蘆田內閣，那一任內閣不是上述舊的反動集團的代表？幣原、吉田輩是保守勢力中的死硬派，固不待言；即使被麥克阿瑟所頌揚爲「中庸之道」的片山內閣與蘆田內閣，也何嘗有過進步的氣息。所謂社會黨內閣的片山內閣，它作爲號召幌子的保障勞工生活、給與農民利益，及自詡爲社會主義性改革的「煤鑛國家管理法案」與「經濟力集中排除法案」等等，結果都是空頭支票或非驢非馬的東西。社會黨內閣徒有其名的「革新」的旗子，實質上比純粹保守的幣原內閣與吉田內閣，反具有較大的欺騙作用。

僞自由主義者蘆田均所組織的內閣，閣員成份也依然與過去幾任內閣一脈相承，面目依舊。蘆田內閣反動的鋒芒，且比片山內閣益加露骨，比幣原、吉田內閣有過之無不及。蘆田曾在議會上重唱法西斯性的所謂「動員國力」的老調，高喊着「國民力集中」。又在內閣中設立一個叫做「臨時行政改革委員會」的機構，進行集權的改革。同時，內閣閣員並不斷與財閥巨頭舉行公開與秘密的會議，竭力替財閥保障利益。爲配合美國的反共，蘆田於美國衆議院通過反共法案的同日，曾宣稱日本將排除共產黨員任公職，把憲法第十四條、第二十二條所規定政治自由與職業自由，視若無睹。蘆田內閣的買辦性，更比過去日本任何內閣爲濃厚，蘆田迭向美國大資本家送秋波，爭取美國的財政援助與一般投資，準備把美日財閥結合爲一體，壓迫日本國內人民與東亞各國。蘆田於本年四月間在全國知事會議上所說「美國有在實質上積極援助日本的傾向，日本的復興，必能意外迅速」，可說是得意忘形之語。

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澳洲代表鮑爾說得好：「麥帥所保護的政府是保守性的，在保護這一政府時，就無法避免同時保護這政府所代表的保守分子的利益。」（太平洋季刊三月號，譯文見六月四日大公報）

四

政黨方面，目前日本所謂三大政黨，都是舊政黨的改頭換面。蘆田均領導的「民主黨」，其前身爲原由幣原領導的「進步黨」，而進步黨的系統爲昔日的「民政黨」，且屬戰時日本法西斯大政團「大日本政治會」的化身。吉田茂領導的「民主自由黨」，是由前「自由黨」併合議會小派「民主俱樂部」，並加入民主黨死硬派幣原、齋藤（隆夫）等合組而成，是自由黨的擴大。自由黨則衆所周知，脫胎於舊的「政友會」。片山哲領導的「社會黨」，是脫胎於舊的「社會大衆黨」，黨內除左派少數人士外，多屬投降大資產階級的「勞動貴族」，社會法西斯、右傾機會主義者。蘆田組閣，被目爲左派的加藤勘十、野溝勝等，居然也同流合汚而入閣，加藤幫着蘆田鎭壓勞工運動，一部份所謂左派的眞面目，日益暴露。

上述三大政黨，控制了大部份日本反動政治的活動，雖然他們之間有時因爭奪領導權或個人利害關係，常有尖銳的衝突、分化，但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民主黨與民主自由黨間，雙方主腦人物之隨時轉來轉去（如蘆田均之由前自由黨轉入民主黨，幣原、齋藤之由民主黨轉入民主自由黨），更可證明兩黨黨性的相同。

除這三大黨外，其餘如由前「國民黨」和「協同黨」合併的「國民協同黨」，由平野力三等社會黨脫黨分子所新組「社會革新黨」，及最近民主黨內太陽系分子脫離民主黨，而另在籌組中的「國民黨」等中小政黨，也都是一鼻孔出氣的。法國新聞社本年五月六日的電訊中，曾引日本政治觀察家對保守政黨的評語說：「如有人認爲日本之一黨，較之另一黨爲淸白，實屬錯誤之至。」

上有大政黨；中與下，還有不計其數的大小法西斯政團，在麥克阿瑟縱容之下，目前正如雨後春筍，到處叢生。這些大小法西斯政團的主要分子，多屬過去日本主義健將、復員軍人、及地方浪人，並以最頑固的地主、財閥、軍閥爲後盾。大公報駐東京特派員高臨渡先生對於這些反動政團的生長情形，曾有具體的報道，讀者可加參考。（見本年三月廿七及廿八日大公報）

維護舊的、壓制新的，這是美國管制日本的基本措施。上述種種，都是美國維護日本舊勢力的結果。

世界爭和平運動的新階段

——再論美蘇關係與世界和平前途

宦鄉

一　把和平巨潮更推進一步

史密斯——莫洛托夫換文的發表，結束了美蘇「冷戰」的第一階段。毫無疑問地，美國戰販集團是失敗了，以蘇聯爲中心的全世界人民爭取和平運動得到了一次重大的勝利。（請參閱「時與文」三卷六期及「世界知識」十七卷二十期拙文。）

這勝利表現在哪些方面呢？最主要的表現是在用眞憑實據表示了：全世界民主力量比反動力量强大得多，要求和平的願望比製造戰爭的宣傳强大得多。

從莫斯科、從華盛頓、從紐約、從倫敦、從巴黎、從柏林、從澳洲……總之從全球各地來的反應，都清清楚楚地反映出，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情緒是如此的積極，如此的昂揚，使得美國戰販集團化了好幾個月工夫，好多億美金，好容易製造出來的「戰爭緊張氣氛」，一下子就被戳穿了、沖淡了。尤其在美國國內，自史莫換文公佈以後，代表着千百萬人民的各種團體，都在紛紛提出和平綱領，呼籲美國政府停止醞釀戰爭的政策，要求美國政府推行一種新的和平的對外政策，而以開始美蘇談判爲其起點。這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第三黨的代表人華萊士，他緊抓着史莫換文公佈後所引起的和平高潮的潮頭，發表了致史太林的公開信，提出了和平解決美蘇之間分歧意見的具體綱領，證明了美國戰販集團所一再拼命宣傳的「美蘇關係絕對無法和平解決」之說爲完全無稽。

這許多發展在戰爭與和平兩大勢力鬥爭總形勢方面產生了一種決定性的新轉變：對戰爭的一般恐懼，已經讓位給對和平的普遍而殷切的希望了：由史莫換文所掀起的和平高潮還有繼續高漲、繼續澎湃的絕大可能。

在這種情形之下，和平陣營方面大家的責任，就是要使和平希望不要幻滅——永遠不要幻滅，同時還要盡一切最大努力來把和平巨潮推向一個更高、更具體的階段。

於是，蘇聯又主動地開始了新的推動。史太林向全世界宣佈，他「認爲華萊士的綱領是可以作爲美蘇協調以及發展國際合作的良好有效的基礎的」，他「相信雖然美蘇兩國在經濟制度和意識形態方面有着差異，但是這兩種制度的並存與和平解決美蘇間的異見，不僅是可能的，並且爲了普遍和平的利益，是絕對必要的。」

這個宣佈，誠如華萊士所正確地指出：「是史氏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身份向美國人民建議和平的聲明；是蘇聯眞正而肯定的建議，表示她願意坐下來與我們討論美蘇間的歧見，從而覓致方法來結束冷戰。」換句話就是說，史太林的答覆，目的在替世界人民爭取和平運動奠定一個新的具體的基礎，他希望把史莫換文向前推進一步，由辯論兩國外交政策是非並空口說白話地保證談判之門幷未關閉的階段，推向用具體綱領來表明確具解決問題的誠意的階段。

二　史華換文的重大意義

爲什麼說蘇聯是確實具有解決問題的眞正誠意的呢？因爲華萊士函中以及史太林覆函中所提出的那些具體綱領，是與蘇聯的一貫政策完全符合的。

蘇聯的一貫政策，如兩年多來的事實所昭示，從不曾超越德黑蘭——雅爾達——波茨坦路綫的範圍。用莫洛托夫的話來說：「蘇聯深信，各國如能本於德黑蘭——雅爾達——波茨坦路綫行事，則任何問題都不難和平解決。」基於這個路綫，所以蘇聯不斷地、幾乎是固執地要求加強國際合作，預防戰爭、裁減軍備、毀滅集體屠殺的武器、制裁戰爭販子、擁護一個堅強而有效率的聯合國機構來保證集體安全和維護世界和平。這些要求，任何人都可看出，不只是符合於蘇聯的利益，同時



也是符合於全世界各國（包括美國在內）的利益的。華萊士函中所提的綱領，並沒有超越於這些目的之外，而美國官方所採取的立場却是完全和各國大多數人民（包括美國大多數人民在內）不同的；當然蘇聯不能不寶貴華萊士的意見，不能够加以「輕視」不予答覆了。

何況，第二次大戰以後的世界形勢，把決定未來世界命運的責任賦予了美蘇兩大强國。美蘇關係的好轉與逆轉，無疑地是決定和平的最重要因素。正如紐約郵報社論所說的：「唯有美蘇談判始能確保和平。今天，世界上有兩個大國，而且只有兩個大國。明天，如果和平沒有保障，戰爭使全世界捲入了漩渦；那麼，就沒有一個國家會處於足以確保和平的有利地位」；現在「既然美蘇兩國政府間並沒有繼史莫換文之後，展開任何談判，而美國官方又不斷公開地要蘇聯提供談判的具體基礎，那就使得史太林與華萊士的互致公開信，更加顯得異常珍貴了。」是的，華萊士提供了美蘇談判的具體基礎，這基礎又「反映了人民鞏固和平的希望與期待」，當然史太林不能不對華萊士這種勇敢的舉動作桴鼓之應，以向全世界——尤其美國——人民表示，蘇聯決不是空談和平。

上面這兩點，恐怕就是史太林公開答覆華萊士的原因。他是把這答覆當作一種爲了鞏固和平及增進國際合作而非採取不可行動來看的。他認爲答覆各節中既可說明蘇聯的立場（事實上就是蘇聯政策的具體綱領），又可當作美蘇談判的基礎，更可把人民爭和平運動更推進一步。

因此，史華換函就決不是一種機會主義的要手段性質的外交陰謀。有人認華氏致函史氏爲企圖增加自己在大選中的聲勢，而史氏答覆目的在替華萊士多搞幾張選票。我想，這種把華史兩人都當作是奸雄的看法實在是不正確的，而且也太低估了史華換函的重大意義。

應當鄭重指出，史華換函是世界人民反戰販爭和平運動與美國人民反戰販爭和平運動的第一次眞正合流，第一次建立了世界性反戰販爭和平聯合統一戰綫的初步基礎。這一點有極大的重要性。如所週知，兩年多來美國戰販集團的獨覇世界企圖，已經遭遇到絕大阻力：她對內侵略本國人民的政策引起了美國人民的反感；對外侵略世界的政策又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不幸，在過去兩年多當中，這兩種反抗並沒有形成一條堅實的聯合統一戰綫，雖然它們是經常地、但零零碎碎地相互呼應着。

這堅實統一戰綫未能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國統治集團的有計劃而巧妙的戰爭叫囂和反蘇反人民宣傳，把美國人民搞得半信半疑、恐懼憂慮，於是發生了社會主義蘇聯與資本主義美國絕難並存的錯覺。這種心理的存在，當然是橫梗在美蘇人民與人民之間建立反戰販爭和平聯合統一戰綫運動的絆脚石。華史換函的最重要意義，就在給予那些宣傳以致命的一擊，把美蘇兩國人民與人民之間的絆脚石給踢開了。局勢既經澄清，各種反動歪曲的宣傳也被清血，這就替世界性人民爭取和平反美國戰販的聯合鬥爭，奠上了堅固不拔的基礎。

三　美國統治陣營的狼狽混亂

經過了蘇聯兩次的主動推動之後，美國人民與世界人民結成的世界性反戰販集團爭和平聯合統一戰綫，就具體化、明朗化起來了。和平陣營的力量大大增長，爭和平的鬥爭被提高到了更新更高的境界，全世界的爭和平巨潮以排山倒海的聲威直向美國的戰販集團衝擊挑戰。

面對着這個波濤洶湧的和平巨潮，美國戰販集團槍法大亂、手足失措了。縱使是右翼的保守的輿論機關，也都不否認開始美蘇談判是最迫切的亟需馬上去做的事情。楊剛先生有這樣一段很有趣味的報道：「史華換函公佈之後，美國大大小小、潛伏和公開的和平要求一齊開了口。不但是左右翼進步主義者乘此說話，即如論壇報一向站在反共備戰政策後面的，在社論上也主張對蘇談判。李普曼雖然曾經宣佈過戰時階段已經到來，但因他覺得華盛頓說話的莽撞而危險，使得蘇聯獲得了宣傳的勝利，也責備政府而主張對蘇聯談判。華盛頓郵報也是如此。美國新聞也如此。甚至於老牌反動的芝加哥論壇報也問不談如何下台。……政府逼得無法轉圜了。」（大公報五月廿日紐約通訊）僅由這個籠罩而生動的敍述，美國統治集團狼狽混亂的情形，就宛然如在眼前。

怎麼辦呢？眞的與蘇聯舉行會議，開始談判麼？美國統治集團不僅心有不甘，因爲她從來就不會眞心誠意地準備這樣做，而且也不敢這樣做，因爲她害怕和平，害怕的不得了。任何對蘇談判走向和平的姿態和舉動，「都可能阻撓垣街——軍閥集團的計劃。這一集團懼怕和平，正像你我懼怕戰爭一樣。他們不要眞正的和平，因爲這樣他們就不能進行摧毀全世界經濟以遂其私慾的計劃了。」（華萊士在加里福尼亞州的廣播辭）。他們所最希望的是「通過秘密談判的方式，把世界劃分成兩個勢力範圍，彼此在均勢和武裝休戰下達到一個暫時的相安。」（李普曼在大西洋月刊二月號文中語）然而這一點剛剛是蘇聯所不能照辦的。消息報說得好：「世界輿論把決定未來世界命

形色色的說蘇聯不要和平（如指摘蘇聯破壞國際協定七次，與塔斯社展開關於十一點美蘇歧見的爭論等等），

下達到一個暫時的相安。」（李普曼在大西洋月刊二月號文中語）然而這一點剛剛是蘇聯所不能照辦的。消息報說得好：「世界輿論把決定未來世界命運的責任交給了美蘇兩强，然而這種責任是必須在全世界各國人民的督促監視之下，纔有完成的可能。」（五月三十日社論）。秘密談判下的假和平，不是世界人民所願意的，所以也不是蘇聯所能同意。所以，「談」的路是美國所不願走也不敢走的。

談既不能，那麼就索性不談了，繼續製造戰爭歇斯底里吧，這也走不通。經過史莫、華史兩次換函之後，戰爭歇斯底里被揭穿了，「緊張氣氛」被沖淡了。美國戰販集團再怎樣努力製造戰爭歇斯底里，美國人民也決不會再相信的。而且，在美國人民以華萊士爲代表，一再公開挑戰、一再坦率要求、要美國統治集團「立刻停止進行冷戰，馬上採取措施，佈置與蘇聯代表舉行會議的範圍、地點和時間，以便和平解決我們兩國之間的歧見」、幷表明「這種勇敢的嘗試必將博得全世界厭戰的千百萬人民的感激、和美國人民最充分的支持」的時候；美國統治集團所感受到的人民壓力，是可怕地巨大的。她不敢不談。馬歇爾廿八日的波特蘭演說就會表示：「我確信在根據美國標準以穩定世界局勢的方面，已有優超的進步」；這是自我解嘲的說辭，但也是敷衍美國人民的一種暗示將與蘇聯談判的姿態。此外，統治陣營中的無數代言人都曾或明或暗地宣佈，「美國應隨時準備與蘇聯政府討論」（貝爾納斯前國務卿），「美蘇如欲解決重大問題，必須在聯合國機構、外長會議或其他國際性會議中爲之」（馬歇爾國務卿、范登堡參議員、奥斯汀首席代表）。這些言辭充份暴露了美國統治階級本心眞不願談，但又迫於人民要求和平的巨大壓力而不敢不裝作要談的窘態。

談既不願，不談又不行，於是剩下來的唯一辦法就只有盡力把現狀硬拖下去，幷且設法在拖局中找藉口找機會來把破壞和平的責任推給蘇聯。正因是「拖」局，所以最近半個月來美國政府所表現的，是一面繼續備戰經濟上的措施（沒有這些措施，美國的經濟危機是立刻就要來的），一面揚言「美國政府不願使美蘇關係停滯在目前緊張而僵持的階段，不久將發動嘗試與蘇聯就若干次要問題舉行談判，以試驗有關重大問題的協議是否有成立的可能。」（這裏所謂次要問題據說又稱技術性質的問題，包括多瑙河航運、美蘇租借債務、特港自由區總督談判的恢復、柏林盟管會的恢復活動等等）（路透華盛頓五月廿九日電）。一面表示願與蘇聯談判，一面又發動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說蘇聯不要和平（如指摘蘇聯破壞國際協定七次，與塔斯社展開關於十一點美蘇歧見的爭論等等）。總而言之，就是一面要迴避談論主題，一面又要做出願意從次要問題談起的姿態。前者是眞心本意，後者則用以敷衍應付在澎湃高漲中的美國人民反戰販爭和平的怒潮。

照目前的時局大勢來看，美國是有可能把這種「拖」的政策繼續一個相當長的時候的。

四　和平運動是國際政治的主流

根據上面這些有關美蘇關係的分析，來看世界政治的前途，我們可以得到這樣幾個結論。

第一、世界人民爭取和平民主反對戰爭和戰販集團的力量，今天被證明了的確是世界政治的主導力量。世界人民已經選擇了應走的道路，今後將排除萬難繼續前進。

第二、美蘇兩强担負了決定未來世界命運的責任。現在，經過史莫、華史兩次換文以及蘇聯的主動推動和美國人民的加緊對他本國的戰販集團的展開反攻，美蘇兩國的人民已經攜手了，世界性的爭和平反戰販聯合統一戰線已經初步奠基了。這可以說是今年世界政治的一重大發展，其結果必然將提高全世界人民對反戰販爭和平運動的信心，決定奮鬥的意志。

第三、在未來世界政治中，下面這幾個因素的力量將再更顯現出來：「1.全世界民衆對於戰販陰謀已更加注意，更加明白，決不致再受欺騙。2.不論美蘇之間在社會制度及意識形態方面有多麼顯著的不同，她們是可以並存的；但美蘇合作的可能性，則只要各國能本於德黑蘭——雅爾達——波茨坦協定行事，任何歧異的意見都可以解決。3.美英及西歐的工農羣衆，決不會輕易同意再來動員，以其血肉來供戰爭販子和帝國主義的驅使奴役。」這些因素的發揮作用，勢將摧毁一切備戰挑戰的陰謀。

第四、經過這次美蘇外交戰之後，戰爭氣氛已經減退了許許多多。這就證明無原則的「妥協讓步只有使對方更加猖獗，英勇沉着堅定反攻纔能阻遏對方的陰謀，推動和平民主政策的向更高一級發展」的名言是十分正確的。

第五、因此，在未來幾年中，如果民主和平陣營能夠繼續努力，團結一致，信賴自己，加强世界反戰販爭和平聯合統一戰線的力量，積極展開對戰販集團的反攻，那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是可以根本克服消弭的，鞏固和平保衛和平的使命是絕對可以順利達成的。

第六、這次美蘇關係的發展，不過是世界人民爭取和平保衛和平神聖大業的一個新起點而已。凡是愛好和平的世界人士，都應當各就自己的崗位，在世界人民反戰販爭和平聯合統一戰綫上，爲爭取和平民主進步而鬥爭，而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一九四八、六、五。

論「非美活動」和蒙特法案

——蒙特法案和戰爭叫囂：一件事情的兩面——

貝遜

在美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官方有一種稱呼，叫做「非美活動」（Un-American activities）。爲着對付這「非美活動」，國會裏有一個特設的領導機關，即「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憲法修正第一款說：「國會不得通過法律來處理關於宗教建立或禁止宗教自由活動；也不能削減言論自由及出版自由；也不能禁止人民和平集會，或向政府請願伸寃。」朗金・湯瑪士（Rankin-Thomas）的非美委員會年來所做過和將做的，正是這裏所謂不得或不能的事。宗教信仰尙且不能禁止，然而現在公務員却要表白自己的「忠心」，電影界也得受「忠心」的檢驗，戰時好萊塢製過一部叫做「北星」（North Star）的片子，寫的是蘇聯西疆一個叫北星的小鎭，如何被納粹突然襲擊，如何英勇抵抗的故事——戰後這部片的編導和主角都被那個委員會指爲有共產黨嫌疑，亦即有出賣祖國的嫌疑犯，這是多麼滑稽的事！難怪華萊士說，這些老爺們對「叛國」兩字有奇怪的解釋。他舉個例說，我要和平，蘇聯要和平，而白宮不要和平，而我就被稱爲「叛國」了。

半年前在非美委員會的鼓吹之下，國會通過了塔虎脫・哈特萊法案。這個法案的條文雖很複雜，但是精髓却可以用一句話來包括：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和罷工的權利大大的給剝奪、削減、和限制了。塔虎脫・哈特萊法案其實引起了與它主觀所預期正相反的結果：它在工人大衆的面前，無情地暴露了全國製造商協會（NAM）與白宮之間的密切關係；它同時使工人運動比之任何時期更加團結了。這半年來團結在華萊士運動的周圍，不只是進步的知識份子，而且有廣大的工人羣衆：這就是事實的答覆。

非美委員會的老爺們認爲這日益增長的人民民主運動，對於金融寡頭的統治，已經或將要構成一種事實上的威脅。他們在這「塵影」面前顯得驚惶失措。爲着打擊這「塵影」，爲着鎭壓以華萊士爲首的人民民主運動，爲着轉移廣大羣衆和落後羣衆的視線，非美活動委員會就在五月一日向衆院提出並力促通過反共法案——這就是後來（五月十九日）在衆院以壓倒的優勢（三一九對五八票）通過的蒙特・尼克生法案（Mundt-Nixon Anti-Communist Fill）或者用它的原名，叫「一九四八年叛國控制法案」（Subversive Control Act of 1948）。蒙特法案在衆院通過後，它還未能成爲法律，現在巳送交參院辯論、作證和表決。


檢查思想

有的參議員說，參院大概很難順利通過這法案；杜魯門也說（讀者應該記得他對塔虎脫・哈特萊法案所做的事吧），他將否決這法案。法案能否成爲法律，這一點目前我們暫且不管。蒙特法案的提出，先在廣大人民——尤其是比較落後的一部份——心裏繁殖着恐怖與憎恨，它劈頭規定：「共產主義運動威脅美國的安全」。有了帽子，文章就不難做下去了：蒙特法案第一步宣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陰謀利用其所控制的各團體在美國境內樹立獨裁」，凡屬於這一類團體均爲「非法」，參加的個人處徒刑十年，罰鍰萬元，並剝奪公權。

這樣一來，讀者的興趣當然集中於這樣的一個問題，究竟那些團體纔算做「陰謀團體」呢？蒙特法案答覆了一部分，因爲它「確定美共是此種外國控制的團體之一」；但這不是完全的答案，甚至不是主要的答案，主要的答案却由檢察長克拉克的口裏作出來了。克拉克五月三十日宣布，聯邦「忠心」審查局，又將另一批三十二個團體指爲「顚覆性的」組織了。這裏必須指出，在這一次之前，已經發表過一批團體名單；在這一次之後，還繼續要發表。這一次名單所包括的團體名字列舉出來，就不難明白這所謂「不忠」是什麼

玩意了。三十二個團體包括：美俄研究所、美國斯拉夫人代表大會、美國籍外人保護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for the Protection of Foreign Born）、美國救濟南斯拉夫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for Yugoslav Relief）、美國援助民主希臘委員會、加州勞工學校（California Labor School）、美國婦女大會（Congress of Women）。有關的團體都已發表聲明，抨擊這種「希特勒主義的傑作」。這些宣言可以引用婦女大會的宣言來代表：「這種舉措祇能增加我們爲自己和我們的子孫底自由而鬥爭的決心！」

本來照聯邦「忠心」審查局的規定，凡是參加這些「顚覆性」的團體底公務員，一律革職，永不錄用；現在蒙特法案更進一步，凡是參加這些團體的（不管他是公務員與否），都有坐牢十年罰鍰一萬的危險了。

至於對付美共，蒙特法案更規定了「直截了當」的辦法：它必須每年向政府提出財政報告和黨員名單，它的黨員一概不准領取護照，也不准在政府裏面担任非民選的職務，其宣傳品一律要註明共產黨來源。

然而對於美共的處置，却不自蒙特法案始。法案還沒有成爲法律之前，美共領袖當中，就有第五個人（Issac Stachel，負責教育方面的領袖）被捕（六月三日），後來雖然交保，但隨時可以把他藉口「外國養的」（foreign born）押解出境。當然，蒙特法案一朝變成法律，如華萊士所說：「只要有一個共產黨員被登記，便將有一千個自由主義者從此不敢作聲了。」

蒙特法案的精神正是在此！它將使萬千被壓迫者不能作聲。它將癱瘓萬千民主戰士的活動。而它目前所要拚死鎭壓的，正是尋求自由的華萊士運動及其參加者。

這並非說蒙特法案還沒有成爲法律之前，華萊士運動的支持者就能夠自由自在的活動了。不是的。華萊士運動一開頭就受到無數的阻撓，華萊士最近在他的「第三黨競選近況報告」（載新共和五月三日）裏面已慨乎言之了。華萊士到 In ianapolis 去作競選演說，全城旅館「奉令」不許收容這一批「不忠」的「妖怪」。副總統競選人泰勒，作競選運動時被警察逮捕，不顧他是現任的參議員；而且把他推到鐵絲網上，劃破了全身的衣服。支持華萊士的教授們都被辭聘，例如伊溫斯維學院（Evansville Colleg ）的聖經教授派克（Dr. Ge rge P rker）祇因爲做了華萊士演講會的主席而被辭退。此外有伊利諾斯州西北大學的十二教授，喬治亞大學的教育學教授巴富特，邁亞密大學三教授，林肯明學院的哲學教授阿台恩，都因支持華萊士而被解聘了！什麼「學術自由」，什麼「公民自由」，還不是和希特勒登台那年，以愛恩斯坦爲首的百千教授被迫出走的情形並無兩樣麼？

然而好戲還未開場，蒙特法案還未變成法律，就已經用愚昧來代替知識；用强暴來代替正義了。反蒙特法案的運動之能在短期間裏面風起雲湧，華萊士運動之能在不到一年中飛躍發展，這就不是偶發的事。

反蒙特法案最初以各團體及有正義感的人士抗議開始，而以集體行動（六月三日由維護民主權利委員會 The Committee for Democratic Righ's 領導三千羣衆向白宮和平進軍，表示抗議）表現出巨大的力量，然後歸結到華萊士進步運動的加强。這就是我一個半月前所說：「戰爭的叫囂越大，和平的旗幟就越爲人民所寶貴」底眞意。

五月三十一日華萊士在參院作證時的聲音是洪亮的，它將吸引無數的愛好自由的公民，團結在進步運動的周圍。他說：「以拯救憲法的名義，我宣稱：憲法是被摧毀了！」「蒙特法案坦白地向美國的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底權利宣戰！……蒙特法案侵入了言論、思想和意見的領域，來鎭壓個人與團體的民主政治活動，這些民主活動的目標，是在國內反對日益增長的獨佔資本底權力，同時在國外反對戰爭的威脅。」華萊士結論說得異常動人：「那些戰爭販子——恐怖販子——憎恨販子，支持像蒙特法案那樣的立法，將來在歷史裁判下，將變成莫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美國版。我們的子子孫孫都會指斥這些爲着自私的目的而製造戰爭歇斯底里的人們。」

蒙特法案的提出和戰爭的叫囂，原就是一件事情的兩面。在戰爭叫囂中，善良的人民被指斥爲「賣國」而下獄，這一舉措不但掩飾了「戰爭販子——恐怖販子——憎恨販子」眞正的爲着自私目的而製造戰爭危機的企圖，同時希望由此可以封緊人民的嘴巴，癱瘓人民的手足。然而林肯和傑斐遜的子孫，難道可以這樣輕易給征服的嗎？

如果我們把蒙特法案被提出來前後，同一批販子們在國際規模上所準備做和已經做的一切拿來參照一下，則白宮的路向更顯得明如白晝。甚麼X行動綱領（對付歐洲的人民運動），什麼杜勒斯的全球反共機構，甚麼世界共產黨領袖名單，其實完全集中於一點：鎭壓全世界的人民主運動。由此可見，蒙特法案不過是華爾街征服世界計劃的計劃之國內部分。如果美國人民不起來用强大的力量把它壓下去，如果世界人民不發出洪偉的吼聲把它壓下去，這一法案就將變成剝奪人類自由權利的一個新開端。我們必須趁開端就把這火源淋熄。在這一點上，我們有權利和美國人民完全站在一邊。

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上海。

美國的進步運動

蘇 V. Ozerov

百老匯一個電影院開映着一部新聞片，新聞片的內容，除了別的事物之外，還有幾個場面是關於希臘近況的。觀衆看見美製的來福槍如何射擊，游擊隊戰鬥員如何用衝鋒機關槍還手，希臘的軍隊如何一步一步小心翼翼的爬上滿是碎石的斜坡。死屍給搬開了，一隊被俘的游擊隊受傷戰鬥員，給帶進一個集中營去了。

報告員的聲音：「傷者當中有一個十八歲的少女。究竟什麼東西使她離了家，拿起武器來呢？」

這個英勇少女的特寫鏡頭出現在銀幕上了。觀衆的反應是製造希臘悲劇的美國人所預想不到的：──電影院裏忽然起了一陣掌聲。

報告員的聲音繼續着：「爲了使城市安全起見，希臘保安當局正在隔離着所有嫌疑份子。」接着這句話，映出了一羣青年──希臘祕密警察的人質。人質給帶走了，他們的面孔流露着憤怒和激動的表情。拍掌的聲音越來越大了，越多了。可是忽地鼓掌一下子停了下來：銀幕上出現了一隊配備了美式來福槍頭戴鋼盔的希臘兵士。

*

第三黨副總統候選人，現任伊達荷州參議員泰勒，最近作旅行競選演講。他到伊達荷州首府的時候，只是預先一天宣布了演講會的日期。然而城裏最大的禮堂（結晶球堂）卻塞得水洩不通。泰勒講完時，請每一個贊同他的意見底聽衆站起來。實際上是差不多全部聽衆都站起來了。比這無言的信任投票還要有意思的是，聽衆在會後的留連。泰勒說，聽衆走到他跟前，和他握手，祝他勝利，如是者幾達一小時之久。

*

我之所以描寫這些小事，因爲它們反映了美國目前在進展着的過程。哈斯特系的報紙在歐斯底里地要求萬千億元的軍備，和實行普遍軍訓的計劃。「紐約日報和美國人」要求一個「強人」做美國的領袖，而哈斯特系的報紙則宣傳擁護麥克阿瑟當美國總統。一個出版家印行了戈培爾日記，另一個出版家正打算出版被絞死的戰犯盧森堡底回憶錄。三月初喬治亞州的三K黨舉行了示威，有一位格林博士在那裏宣稱：如果允許一個黑人去參加地方選舉，那麼「南部諸州的街頭就非流血不可」。

人民對這些反動力量的活動和戰爭的煽動有什麼反應呢？

華萊士的祖父H．華萊士所創辦的「華萊士農民」雜誌，最近徵求讀者意見，問他們最關心的是什麼。百分之六十四回答：美蘇關係的惡化。

安全理事會最近討論巴力斯坦問題的一次會議上，美國代表奧斯汀號召「採取強制行動」時，一個穿了喪服的高個子的女性，從她的旁觀席上站起來，大聲嚷道：「什麼行動？我決不讓你們把我最後一個兒子搶走的。」

*

美國報紙想用想像中的威脅和危機，來嚇怕美國的老百姓，而老百姓卻開始關心華萊士的演說了。一個廣泛的進步運動已經在華萊士競選總統運動的周圍崛起了。這是善良的美國人，要求和平、工作和自由、擯棄戰爭的恐懼的運動。

華萊士的第三黨已經作爲一種政治力量存在了，它已經對美國的生活和民主共和兩黨的政策投下了重大的影響。第三黨已經有了它的綱領，那是在華萊士歷次的演詞中包含着的，它也已經有了一個羣衆的基礎，那就是美國進步公民協會（PCA）和紐佳色、紐約、伊里諾斯、加里福尼亞和賓夕凡尼亞諸州的進步黨。

美國進步公民協會在過去的一年間，已由一個比較狹小的智識份子和活躍的職工會員底團體，發展而爲一個在二十六州擁有十萬會員的羣衆組織了。有五州已經在組織州分會。美國青年進步公民協會（YPCA）已在不止一百間的大學和獨立學院中成立了分會。藝術科學職業界的協會團結了萬千的進步知識份子。

美國進步公民協會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鮑爾溫，在該會第二屆年會中致詞時，曾解釋這個組織之所以增長，是因爲它爲人民的利益而奮鬥。他宣稱：協會站在爲公民權利鬥爭和反對種族歧視鬥爭的最前線。協會曾爲保留物價管制和房租管制而鬥爭。協會曾要求採取措置來打擊通貨膨脹，來取消塔虎脫・哈特萊法案。協會的全國委員會曾召集了一個保衛學術自由的大會。

我曾在一月下半月，參加了芝加哥舉行的PCA第二屆年會。

當年會的主席肯尼（Robert W. Kenny）宣布華萊士致辭時，聽衆報以洪偉的掌聲。當華萊士走進來的時候，幾百個代表和來賓站了起來。

掌聲越來越響亮了。在會場中央的代表們離開了他們的座位。許多招貼，上面寫着：「我們需要華萊士」、「華萊士應做白宮主人」、「擁護華萊士，反對戰爭」，都舉起來了。代表們在會場裏面的通路游行示威。他們是來自各式各樣生活的男女：我認得一個有名的哈佛大學教授、一個聖路易士的黑人社會工作者、一個好萊塢製片家、一個賓州的出版家。……椅子差不多全空了，一隊接着一隊的會衆參加了示威的行列，他們充塞了全部的走道了。掌聲和歡呼繼續了整整十分鐘。

*

年會一致擁護華萊士當總統候選人，並且決定凡有PCA存在的各州，立即進行競選工作。

年會是以典型的美國氣派作結的。羅比孫（Paul Robeson）站在麥克風前，以有力的聲音，唱了一首關於華萊士的歌。歌詞我已經記不起了，只記得合唱的一句由全體附和，那是：「華萊士所好的，也就是我所好的。」歌還沒有唱完，好些女孩子就拖了長長的白旗，沿着走道走來了。在十分鐘和十五分鐘裏面，已經徵募了好幾千塊錢，這是一個不少的數目。去年協會募了四十萬元，約莫等於全國製造商協會正式花在宣傳上的總額底十分之一。

*

一九四八年一月，芝加哥的進步份子組成了伊里諾斯進步黨，宣布在未來的總統競選中支持華萊士。

紐約舉行的特別國會選舉（Special congressional elections）底故事，尤其富有教育意義。紐約州在全部總統選票五三一席中佔了四十七席，所以紐約州在總統競選運動中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布朗克斯舉行特別選舉時，民主黨的地方領袖就決定拿它來作

一次「試驗」。

民主黨的老闆們從沒有一刻鐘懷疑過他們的候選人伯羅柏（Propper）會控制不住這個地區。布朗克斯民主黨組織是弗林（Ed Flynn）親自領導的，而弗林則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最有力的領袖之一，且曾担任過全國委員會的主席。誰都知道在一九四四年民主黨全國年會中，弗林曾用巨大的壓力，使羅斯福選取杜魯門做他的副總統，而不要華萊士。弗林宣布，已派出六百個選區領袖到這裏來進行民主黨競選的活動。在選舉日之前幾天，帶着同樣的目的，弗林還動員了二百五十位僱員。事實上他已經如此確信勝利在握，以致他甚至已經準備好一篇勝利聲明，一等選舉結束，就立即發表了。

但事情卻並非盡是如意算盤。伯羅柏的對手是進步黨候選人，前任議員伊薩克遜（Leo Isacson），此人是標出華萊士綱領來的。

結果伊薩克遜得二二、六九七票，伯羅柏（民主黨）得一二、五七八票，德・尼格里斯(De Nigris共和黨)得一、四八二票。

這些結果造成了很重大的印象——而且不僅在紐約。報紙一連發表了三天的社論，討論這件事。投票的結果，顯然不僅僅等於對伊薩克遜有利，而是（這纔是重要點）表示反對杜魯門、馬歇爾的外交政策和對內政策。

進步運動的中心之一是加里福尼亞。加州的獨立進步黨和PCA合作，爲了登記華萊士爲候選人，曾徵集了四六四、〇〇〇人的簽名，雖然只要二七六、〇〇〇人就夠了。

加州的第三黨運動是由萬千工人和活躍的職工會份子支持的。

「擁護華萊士競選總統委員會」已在四十八州中的四十四州建立起來。紐佳色州獨立黨候選人的登記最近就可以完成。那裏提出的是：總統候選人華萊士，副總統候選人泰勒，參議員候選人嚴勃里（James Imbrie，前銀行家，曾任汽車工人聯合會罷工基金司庫）。在一九四四年，這位嚴勃里曾組織了紐佳色獨立公民協會，對於爭取無黨派的選票支持羅斯福的工作，曾有不小的貢獻。

*

獨佔資本的報紙製造了許多謠言來中傷華萊士和泰勒，同時要破壞第三黨的力量。他們把紅帽子戴上華萊士的頭上，說他的觀點就是共產黨觀點。然而，衆所週知，華萊士是擁護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只不過他贊成和平的外交政策，反對獨佔資本的無比大權罷了。他同時又爲着二百七十萬小企業家的利益而奮鬥，根據統計，在這二百七十萬小企業家當中，和獨佔資本競賽了五年（或不到五年）就有五分之四給淘汰了。他們本身是崩潰了，他們又把位置讓給新的破產候補人。

反動勢力用盡種種方法，阻止職工會參加競選運動，支持進步的候選人。向右急轉彎的產大（CIO）的領袖，曾訓令它所屬的工會，在任何情形下面不得支持華萊士。

然而華萊士卻恰恰得到各地職工會的熱烈支持。在美國，競選運動是一件非常花錢的事情。據說一九四四年杜威爲了要擊敗羅斯福，曾花費了八千萬元。華萊士的競選基金卻是由很小很小的捐贈來構成的。

毫無疑問，支持目前兩黨反動聯合政權的「錢袋」，卻會在他們的權力所能做到的範圍內，多方設法把他們的自己人放到白宮裏去。但不管選舉的結果如何，在競選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進步運動，將在美國的政治生活上留下一道深刻的印痕。

（怡・節譯自四月十四日「新時代」）

司徒大使聲明讀後感

傅彬然

編輯先生：

前天承面囑寫點「司徒大使書面聲明」讀後感，當時覺得心裏想說的話很多，所以滿口答應了，可是昨天夜裏，提起筆來想寫，卻竟覺無話可說了。文章寫不成功，只好給您寫這封信，借此表示我的歉意。

我願意坦白告訴您，這兩三年來，我對美國是老早就看穿了，可是，我自己是「書生」，所以我對於這位白髮蒼蒼、對人文溫爾雅、彬彬有禮、帶「書生氣」的老教育家司徒雷登先生，是曾經衷心崇敬過的。就是在他初做大使的時候，我也曾對他存過一些幻想，我總以爲由他老先生來做中國大使，對於我們的民主和平的事業，總會有許多幫助的。深可惋惜的是：司徒先生做了大使以後，我們對於他的崇敬和信賴的程度，竟與時間成了對比，到本月五日的清晨，在報紙上看到他的「書面聲明」，我心裏的反應更其複雜，容許我率直的說一句，我從這篇聲明裏所獲得的印象是：我們的司徒先生那種「沈重的心情」，已經「逼」使他到了「急不擇言」的地步，而他說話的態度和所說的內容，跟他個人的歷史和身份簡直聯繫不起來了。這不由的使我起了一種雜帶惋惜、悵惘和悔恨的混合的情緒，這種心境，彷彿跟受了多年來的好友的欺侮時所感到的一般。

您看了我上面的一段話，也許要譏笑我迂腐吧。這在我是樂於承認的。但同時我也未嘗不了解別人所說的許多道理，像說「司徒雷登先生的談話，不免使人感得他有代表美國華爾街發言人的嫌疑」（引立法委員劉不同的話），或者說個人的行爲是無法超越他所屬的階層或集團的，要知人論世，得着眼到社會的基礎之類的話，我都很相信，可是，我上面所說的那種想法和心境，卻也是事實，我不願意隱瞞着不說出來。

您也許在想，對於司徒大使，可以說固然不多，對於司徒大使所代表的美國的執政者們，不是有很多可以說的嗎？但我也以爲是無須說的，自從羅斯福總統逝世以後，美國政府對世界的以及對他們自己國家的所實行的是什麼政策？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愛好民主、和平、團結、進步的人民對於美國所實行的政策的反應怎麼樣？這些事實，美國的執政者的自己難道還不會知道的嗎？全世界（包括美國在內）愛好民主、和平、團結、進步的人民難道還會不知道的嗎？「事實勝雄辯」，又何必多說呢？

不過我始終是個書生，我還想貢獻司徒先生一點意思。司徒先生是在我國生長的，他對中國文化了解很深刻，我還是希望他在處理大使職務之餘，能夠想到我國儒家的忠恕之道，易地以處，替中國的人民想想。

六月八日

蘇聯文學三十年（下）

A·克拉格諾夫作　何家槐譯

很多毀謗蘇聯文學及其對於國家的關係的書籍和論文，在資本主義的國內出現，特別是最近一個時期。這些汚辱蘇聯文學的造謠專家們，大都是在保衞「藝術自由」的大纛之下實行攻擊。可是，事實上，一個作家的自由程度，並非被決定於他把這個自由叫得如何響亮，而是要看他所服役的社會勢力和他對於牠們的態度。一個效勞於社會的或民族的壓迫勾當的作家，顯然的連他自己也不自由。例如一個美國作家如果容忍歧視黑人或者贊成在印度尼西亞進行帝國主義屠殺，那他也一定不能自由。同樣地，一個藝術工作者如果幫忙主子奴役人民（不論他們是白人或是黑人），那他自己簡直是雙重的奴隸。因此，只有爲自由、爲自由社會服務的藝術家，或者，即使他所屬的社會尙未獲得自由，他也英勇地投入那爲人民自由而戰的鬥爭中的藝術家，才是眞正自由的。



其實這些滿嘴自由的布爾喬亞批評家們的花言巧語，並不能遮掩布爾喬亞藝術和布爾喬亞社會的相互關係的眞相。特別不能掩飾這一個事實：這些反動的批評家攻擊蘇聯文學，不斷地把咀咒和謠言投擲過來，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完全由於他們一向都是卑躬屈節地聽從資本家們的命令。對於這些批評家，藝術的自由並不是一回實在的事情，而只是一種便於進行欺騙說教的綱領。他們借用自由的名義，或把它當作打擊蘇聯的作家，或把它當作遮掩他們自己那可恥地、諂媚地、卑賤地匍匐在錢袋前面的裸體的無花果葉子。只要隨便翻一翻英美雜誌，我們就可以發現這個文學依賴着金錢的現象，就是英美作家們自己也已感覺到如何的煩惱。此外，我們還必須指出：英美作家對於商業侵入藝術的神聖殿堂的訴苦，不但見之於「主流」（Mainstream）、「時代」（Our Time），即在星期六文學評論（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地平線」（Horizon）、和「新寫作」（New Writing）這一類絕對不會有批評布爾喬亞社會的嫌疑的雜誌上，也可以看到。

毀謗蘇聯文學最粗魯和最厚顏的雜誌之一，就是英國的「地平線」。正當蘇聯報紙登出聯共中央關於「星」和「列寧格拉」的決議的時候，它就發表了一篇專論蘇聯文學的社論（一九四六十月；八十二號）。它是以五大要點作爲結論的，這無疑的是它的政治立場和美學信條。這信條的口吻和語調，的確使我們大大吃驚。因爲，我們對於這個自從史蒂爾（Steel,1672—1729）和安迭孫（Addison, 1672—1719）以後曾經產生過大批著名的批評家和政論家的國度（即英國）裏的老牌雜誌，在接觸到美學問題的時候，我們一向是採取更嚴肅的態度。可是「地平線」的人却不顧羞恥地用曖昧不明的油滑腔調來代替合理的科學的分析，用造謠中傷來代替論爭。他們採取了莫明其妙的「反國家的虛無主義」（Anti-State Nihilism），把資本主義國家當成鼓勵「爲藝術而藝術」的善意而無害的小海勾力士（Hercules），而且將那曾經產生莎士比亞和狄更斯的文學的命運交托給由於痛苦的童年和因爲生活的無意識而致內心受傷的神經衰弱和精神錯亂，這種可怕的退嬰和墮落，原是有其社會根源的。

最近幾年的歷史，供給我們很多暴露個人主義藝術觀所包含的眞正社會性質的例子。在戰前，我們知道安特烈·紀德（André Gide）就是一個主張「藝術自由」的重要理論家和布爾喬亞個人主義的代表。

「沒有自由，藝術就失去了它的意義，終至於毀滅。」一九三六年，他曾在他的「歸自蘇聯」中這樣說過。他大言不慚地奢談着「藝術的無限自由」、奢談着個性的自由，毀謗着蘇聯、攻擊着蘇聯政府限制個人的自由和藝術的自由。

可是戰爭終於爆發了。一切理想和理論必須在歷史面前接受嚴重的考驗。結果怎樣呢？事實是很明顯的：紀德所日夜說教的自由並不能鼓舞它的信徒們去反抗摧殘自由的法西斯。布爾喬亞的個人主義哲學，只不過是

讀者·作者與編者

關於「美國第三黨運動」

世界知識編輯先生：

讀完貴刊十七卷十七期上貝遜先生的「美國第三黨運動與大選」一文後，心中有說不出的一種感覺，第三黨運動的蓬勃發展固然使我興奮得很，但我仍要提出我的問題請求您解答：

（一）該文上開列右派民主黨及所謂自由份子的一串名單：進步公民協會領袖之一的金頓、ADA的大部份領袖、CIO的摩萊……等創造出「小害爲佳」的理論來分化華萊士的陣容。金頓是機會主義者已無疑，CIO的上層領袖——貴族工人聽命於華爾街，反對華萊士也不必說，但是——E·羅斯福和F·羅斯福（我想大概是指羅斯福總統的次子及第三子伊里奧特·羅斯福和佛蘭克林·羅斯福）由前者所著的「如他所見」和訪問蘇聯在史太林談話的事實看來，可知伊里奧特是一個眼光並不偏狹，思想相當開明進步的人，但現在居然起來擁護艾森豪威爾參加競選，而反對華萊士；還有CIOPAC曾支持羅斯福總統，是一個相當進步的組織，而現在也反對華萊士。這情形確是令我總想不明白的。我想上兩者（小羅斯福與PAC）縱然在某方面不贊成華萊士的主張，但他們總不會反動到：「因爲他們明白艾將軍是完全符合不僅右派民主黨，而且是共和黨的全部要求的」或「欺騙落後的人民投他的票」這個地步吧！

（二）雖然只有武斷家才會推斷今年美國的大選結果，但倘若華萊士競選果然獲勝的話，對於我國的內戰與民主有沒有決定的影響呢？

一二一三三號定戶　五月十四日

一二一三三號定戶先生：

來信收到。你提出的問題亦曾爲許多讀者所提到，特請原作者貝遜先生簡答如下：

編者

來信讀過，知道你這樣小心研究，非常感奮。所詢兩點，謹就所知附奉如下：

（一）那篇文章所指，正係伊利奧特和佛蘭克林。這是根據塔斯社紐約廿九日電的，原文說：「提名一個政治態度爲大家所不知道的人爲總

妥協主義的準備。戰爭表明了自由的眞正的保衛者和救主，原來是曾被紀德先生那樣汚衊爲「缺乏自由」的英勇的蘇聯戰士。而正當法國呻吟於侵略者鐵蹄下的時候，這位「個性自由」的預言家，却在他的日記上這樣寫道：

「跟昨天的敵人和解，並不是什麼卑怯，而是常識，是接受不可避免的命運……反抗命運的人必遭羅網。幹麼要去撞監獄的柵欄，白白的使你自己受傷？爲了要使你自己在牢房中受苦最少，最好的方法就是乖乖地——在它的中間靜靜地站着……」

接着他又寫道：

「壓迫並不能汚辱最優秀的人士，其餘的人則可以不管……忍受萬歲！當最缺少自由的時候，精神才能完成最崇高的美德。」

連這樣無恥的話，居然也假冒「自由」的名義。紀德大約想說服他自己和別人：不但自己馴服地坐在牢房中間，而且也勸別人俯首聽命於敵人的法西斯囚徒，要比那些雖則被俘，却仍然不怕在監獄柵欄上弄傷自己的手，企圖解放他們和早日恢復自由的戰士們更爲自由。

正在他的祖國和同胞遭受嚴重威脅的那個時期，這位布爾喬亞個人主義和「自由」的詩人，變成了「容忍」精神的歌手，因而發現他自己是和賴伐爾（Lavel）同在一個營壘裏面。可是，安特烈・紀德並沒有分享到這個繫着白領帶和有一顆黑良心的法奸的命運；他逃避了應得的懲罰。而且，更甚的是，戰爭一結束，他就接受了一個英國最老的大學（按卽劍橋。去年十一月十三日，諾貝爾文學獎金又贈與了紀德，中國各雜誌報章上也曾很有些人喝彩歌頌，極力捧場——譯者）的名譽學位。據說在替這個叛徒舉行卑鄙的加冕禮的時候，竟沒有一個人臉紅哩。

安特烈・紀德的例子，並不是獨一無二的。英國批評家約翰・賴門（John Lehmann）就曾在戰爭時期，和他的同志們一道「熱烈地主張他們應有權利在本來需要熱情的時候，表示憂鬱；應有權利自由地抒寫糾結在花園牆上的玫瑰，棲息在柳枝上面的魚狗，情婦的肉體之美，兒童時期和學校時期的古怪遊戲，以及與戰爭無關的一切……」曾經在「新寫作」和「日光」（Day-light）上大發牢騷，非份地要求在戰爭時期也得容許他躲進象牙之塔裏「寫作、思想、和呼吸」，和曾爲法西斯奴才和賣國賊辯護，稱塞林（Celine）爲偉大作家的奧斯勃・薛威爾（Osbert Sitwell），也是和賴門一鼻孔出氣的「自由主義者」。但布爾喬亞的個人主義文學，在反法西斯的戰爭中，是表現得多少無力啊！美國批評家大衞・珂恩（David Cohn）發表在「星期六文學評論」（一九四七年第三期）上的「戰士應該思想嗎？」一文，就把這個事實表現得清清楚楚。

在戰後，布爾喬亞的個人主義文學和哲學——從亨利・密勒（Henry Miller）的色情主義一直到沙特（Sartre）的存在主義的詭辯，都把懷疑和悲觀帶給讀者，都以抽象的「個性自由」爲掩護來欺騙讀者、麻醉讀者，使他們不相信人，不相信能夠改造生活，換句話說，就是企圖在精神上解除他們的武裝，實在是很惡毒的。

這一種文學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都得到了支持，大批的出版，大幅的廣告；卽在那些充斥着口頭誇耀反布爾喬亞的假革命的人物的國度裏，也是如此。這並不是偶然的。不管布爾喬亞個人主義者受的是那一種任務，幹的是那一種工作，都無非是爲的幫忙統治者奴役人民，都是反動的勾當。它的性質，是被決定於它所屬的社會的。列寧曾經說過：「布爾喬亞的作家、藝術家、女伶的自由，同樣地都只是一種假裝的（或者虛僞地掩飾着的），依賴錢包、賄賂、和贍養費的附屬品。」

當然，在布爾喬亞的批評家中，除了像史屈洛夫（Struve）、依斯曼（Eastman）、和「地平線」的記者那樣存心誹謗的造謠專家外，也還有一些因爲無知，因爲不了解蘇聯文學的特殊性質，而使自己的文章變成謊話的人。他們用布爾喬亞社會的碼尺杜他們自己的心理來測量所有的文學現象，把任何一種依存和服務（不問是什麼國家或社會力量），都看成了文學的束縛。他們根據他們自己的實際地位，他們自己對於錢囊，對於資本家主子的卑躬屈節的依賴，去了解其他的文學。他們忘了對於自由的服務，決不致成爲奴隸。他們不能理會如果一個蘇聯作家處處以國家爲念，如果他全身獻給人民，那他必然要以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精神從事寫作，而在這兒就有他的最大的自由——隨便抒寫他的感覺和思想的絕對自由。

假使蘇聯作家在反侵略戰爭時期，要和賴門先生所說似時寫作，那一定是一個可怕的自我歪曲和一件反對內心自由的事情。正如偉大的俄國民主主義者尼古拉・巧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寫給詩人尼克拉索夫（N. Nekrasov）的信裏所說：「當果戈里寫『巡按使』的時候，他是絕對自由的，因爲他的天才傾向於寫像『巡按使』這樣富於社會意義的作品……」蘇聯作家也是絕對自由的，因爲他們的天才傾向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因爲不論在生活或文學中，他們都是他們人民的子孫，都是他們國家的公民和愛護者。（一八四八，五，二十一，節譯自 Soviet Literature）

統候選人；這種運動，三月二十六日，又受到一種推動，羅斯福總統的兩個公子——伊利奧特和佛蘭克林——分別發表公開聲明，敦促艾森豪威出任候選人。」

至於 Eliot 究竟轉變到如何程度，此刻我們還沒有詳盡的資料。不過這一類人的進步性，本來就有許多限制的。試舉一例：曾經替華萊士寫過傳記，在一九四四年組成的藝術、科學與職業界獨立公民委員會（Independent Citizens' Committee of the Arts, Sciences and Professions)曾任副主席的金頓（F. Kingdon），現在也躲在獨佔資本的門下大罵第三黨了。

Franklin 的情形比較簡單些。他是右派ADA（民主行動委員會）的領袖之一，素來是不支持華萊士的。

（二）產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CIO-PAC），自 Hillman 死後，領導權卽落入反動的上層工人貴族手中；這個委員會現在出賣了它的工人羣衆，變成支持杜魯門重任總統的機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CIO的上層領袖不是在無條件的支持馬歇爾計劃麼？至於CIO爲什麼在羅斯福時代表現出進步的意識，而現在又變成AFL一類的工會，在研究這個問題時，必須分清楚CIO的下層成員始終還是進步，只是上層領導機構叛變而已。今年一月CIO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就有代表一百五十萬會員的(約佔全體四分之一)代表反對CIO的倒退政策。

（三）現在世界各國陣線分明，華萊士在美國是代表進步的一羣的，他們不贊成華萊士，就必擁護杜魯門（或其他反動派）無疑；所謂中間路線云云，實在是騙人的。而在這之中有些人明白杜魯門的威信太差，因此支持威信較好的艾帥出山，那也是很明白的。至於所引的幾句話，是作者分析他們時說的，他們自己決不這樣宣傳——儘管他們心裏明白。

（四）華萊士獲勝，對於整個世界民主陣營，自然是增加了很大的力量；就整個而論，對於爲民主而鬥爭的中國人民，當然是有利的。但是我們不能說會對我們的民主運動有決定的影響。能決定中國民主革命成功的，不是任何外力，而是中國人民自己。

貝遜

Monda Kulturo　World Culture
Culture Mondiale　Weltkultur
Cultura Mundana　Культура Света
Cultura Mondiale　Wereldcultuur

世界知識　第十七卷　第二十三期